

西-葡國王菲利普二世 以及菲律賓與帝汶的關係

索 薩*

在我對東帝汶的最後幾次訪問其中一次是在東帝汶於2002年5月正式宣佈獨立（或稱恢復主權）之前的幾個月，我到了東北部的馬納圖托區，當地人與一支為聯合國維和部隊工作的菲律賓軍隊的親密關係令我深感震驚。我曾向來自不同社會階層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詢問其中原因，幾乎所有人都會做出如下解釋：“菲律賓人與東帝



菲利普二世肖像 意大利畫家 Sofonisba Anguisciola（1532-1625）繪
馬德里 Prado 博物館藏

汶人是很相似的。”當我們將注意力從現在的維和官員身上轉移到一些最重要的東帝汶機構上時，我們立刻感到對在當地佔主導地位的天主教堂進行一番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現今帝汶島的大約80萬人口中，95%的人經常去教堂。在東帝汶的教堂我們遇到許多菲律賓人，他們為幾個不同的天主教機構工作、授課或佈道。實際上

* 索薩（Ivo Carneiro de Sousa），葡萄牙文化與歷史學博士，波爾圖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亞洲問題研究生班協調員，目前擔任葡萄牙東南亞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及協調員，從事有關葡萄牙在東南亞活動期間的歷史和宗教人類學的研究。

在少有的幾個非東帝汶人教區的助理神甫中就有一位是菲律賓人，他是波波諾拉（Bobonora）區的神甫。其他一些菲律賓神甫也都有各自的神職任務：帝力主教區的主教就是一位十分活躍的菲律賓人；在社交方面這一職位相當於一位部長；從“慈幼會”到“聖芳濟會”，我們還可能發現許多其他菲律賓神甫和修女，他們領導着教會醫院、兄弟會和慈善機構，有的甚至指導開辦了一些頗有意思的藥房。普通的東帝汶人通常不信任奇怪且昂貴的西方藥品，因此他們一般寧願在這些藥房挑選一些替代的藥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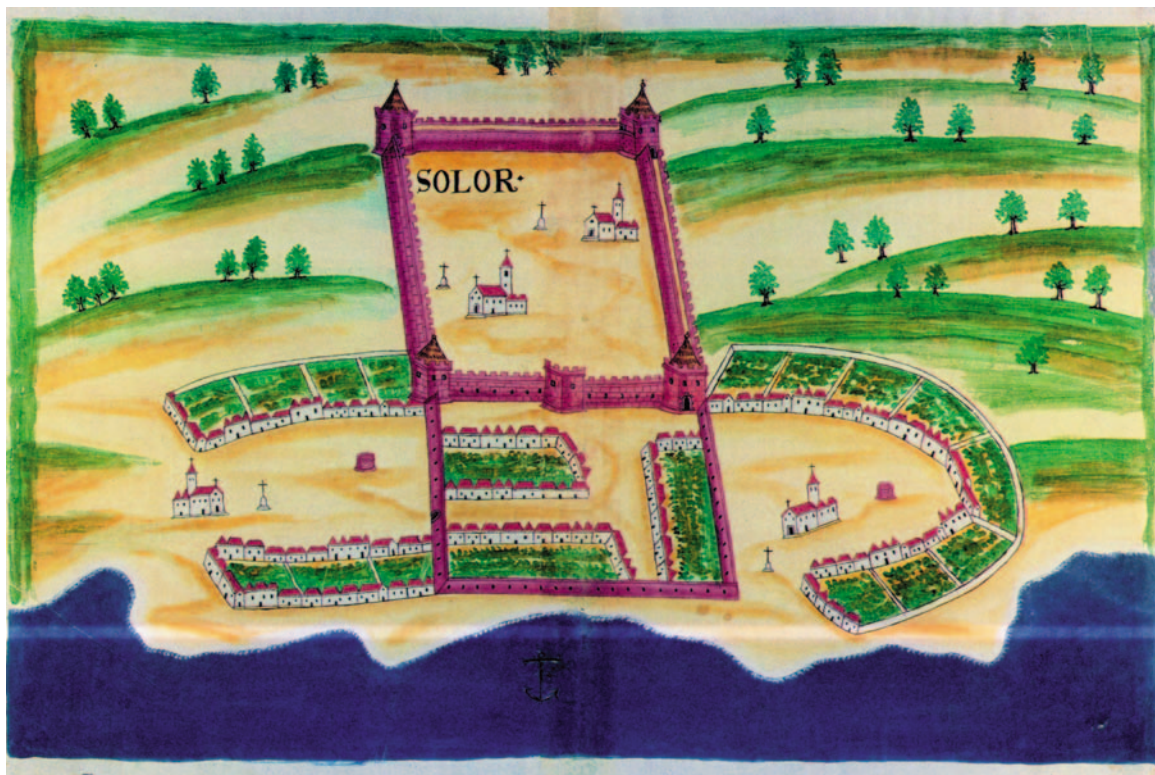
作為一名專業歷史學者，當我在前帝力博物館的少數遺產中發現許多16-17世紀通行的銀幣雷阿爾（reale）時，我更加驚訝了。這些雷阿爾現在暫時代管着，也有一些是私人藏品，甚至還有的出現在當地的古董市場上。⁽¹⁾這些收藏品使我們想起曾經在此地風靡一時的美洲銀幣，它們是由往返於太平洋西岸與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之間的西班牙商人和菲律賓殖民者帶來的。令我更為驚訝的是大多數傳統東帝汶珠寶恰好就是由這些被熔掉的古老的西班牙雷阿爾製作而成的。在當地國王的傳統頭盔（kaibauk）上甚至可以發現由那些曾因通行世界而聞名的雷阿爾製成的裝飾。在重大社交場合和當地宗教節日上，勇士們會驕傲地佩戴這種頭盔。這一文化傳統至今根深蒂固，影響力很強大，以至於現在那些難得一見的老珠寶商們仍然喜歡使用那些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流通的大號墨西哥比索來鑄造工藝品，這些工藝品主要是出售給那些為聯合國和一些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外國人。直到現在，這些比索還可以在帝力市中心的紡織品市場通用。作為一名擁有二十年經驗的專業歷史學者，我的一些“偏見”使我對此產生了幾點疑問：這些古老的美洲銀雷阿爾和比索甚至直到今天還是當地王朝和神廟（uma lulik）重大傳統財產中的組成部分，那它們究竟是在何時何地傳入的呢？從當地牧師到平民百姓都把菲律賓士兵和官員看作是“兄弟”，對於他們之間的這種兄弟情誼我們又該作何解釋呢？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怎樣看待菲律賓人在東帝

汶天主教堂中的存在和作用？

首先要考慮的普遍答案就是，儘管東帝汶在幾個世紀裡屢次陷入葡萄牙的暴力殖民統治下，但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東帝汶都是一個東南亞國家。然而東帝汶各民族鮮有與外國人（malai）保持良好關係的。他們對那些奇裝異服行為怪異且奉行不同經濟制度的外來者向來抱着疏遠的不信任態度。在東帝汶工作的一些東南亞國家使團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而僅僅被看作是在聯合國決議承諾的指導下來執行維和任務的必需品。從新聞工作者到各團體都表示：“我們感覺不到他們與馬來人、泰國人之間親密友好的關係，當然與印尼人的關係就更淡薄了。”相反，我們對此有一種矛盾的猜疑：我曾聽幾個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官員在同聯合國人員談話時認為東帝汶在建立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國家方面缺乏能力，也曾聽當地政客抱怨近年來在爭取東盟對他們為爭取解放而鬥爭的認同方面不盡人意。或許事實總是更為複雜且難以調和的，但我從沒聽任何人抱怨過菲律賓使團。反之亦然，菲律賓人也從未非難或嘲笑過這個幾個月前剛剛獨立的國家所採取的新措施。這些措施在那些從事研究的歷史學家看來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就此看來，東帝汶人與菲律賓人之間的特殊關係還須重新解釋，那也許恰恰就是來自歷史學家的解釋。

索洛島和帝汶島的軍事地位

當我們就葡人對帝汶島的最初幾次接觸研究之後，發現無論是以上哪種答案都是很難找到的。那時對於摩鹿加群島和馬六甲的葡萄牙商人和士兵來說，帝汶島屬於偏遠地區。實際上，東印尼地區，從爪哇到帝汶島，是由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的青年葡萄牙地圖測繪專家發現的。此人是一位領航員，在葡萄牙1511-1512年間首次航行摩鹿加群島時也做出卓越貢獻。⁽²⁾羅德里格斯及其同伴們並沒有從帝汶島及附近島嶼經過，但他在舉世聞名的航海書中他第一次記錄下了帝汶島、弗洛斯和索洛島，在這件事情上，他誤將



索洛島要塞，摘自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的《東印度州各要塞、城市和居民點圖冊》（1634年）

小島索洛島當成了東弗洛斯特和阿杜納拉島。帝汶島被仔細繪出並附有這樣一句簡明而又頗具傳奇色彩的描述：“這就是帝汶島——盛產檀香之地。”⁽³⁾現在我們知道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所繪製的東南亞地圖很可能是參考了當地商人所使用的中國航海圖，因為在那之前他就曾研究過東方的航海地圖。在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領葡人征服馬六甲群島之後，葡人從一個“爪哇領航員”手中得到了一份最為詳盡的東方地圖。而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又用葡萄牙的繪圖技巧重新謄寫了這幅地圖，然後帶回里斯本獻給曼努埃爾國王（Dom Manuel）。⁽⁴⁾

最繁榮的葡萄牙貿易僅僅出現在1512-1556年間，最多不會超過1561年。通常，這一時期主要由以商人和冒險家構成的私人企業佔主導地位，而非以領土佔領和殖民機構的形式為主導。他們與帝汶島的接觸起初是在葡萄牙官方指定的索洛島群島

的周邊地區，包括從弗洛斯特到阿洛群島，其中帝汶島由於其特殊的商業地位和盛產白檀而倍受關注。白檀可用作薰香和香水的原料，還有藥用價值，因此被出口到中國和印度。儘管帝汶島的邊緣化地理位置使這種出口變得非常不規律，但在5-6世紀白檀的出口還是在當地貿易中佔主導地位。從12世紀末開始，白檀貿易就吸引了許多中國商人和冒險家。在15世紀，馬六甲海峽將白檀的產地和銷售地連接起來，因而白檀貿易也就隨之變得更加繁榮了。在1514-1519年間，已佔領馬六甲的葡人試圖正式操控每年的白檀貿易，要麼直接開始介入，要麼就與同摩鹿加和爪哇之間的香料貿易同時進行。但這一切都要受季風限制，而且必須在馬六甲海關和財政控制的基礎上進行。然而在許多私人團體或商人的貿易活動中，他們卻顯得有些束手無策了。

1522年，安東尼奧·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在對麥哲倫海峽的西班牙古代王國遺產進

行探險時，途經維多利亞到達帝汶島，並將帝汶島看作是安伯努（Ambenu）地區的商業中心和白檀貿易的象徵。他認為爪哇和馬來商人的大量出現主要是受白檀吸引，但急速發展的石蠟貿易和奴隸交易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⁵⁾當時一些葡萄牙商人和航海家也到過帝汶島北岸，但他們更願意停靠在索洛島，雖然這個島很小卻擁有更好的錨地使他們能更好地控制弗羅斯海峽。1550年以前，葡人並沒有在這一地區定居殖民，因為他們更願意在這個島上作暫時停留來從事有利可圖的交易，或是為他們裝載白檀提供方便以利於他們與當地商人競爭。後來，直到16世紀60年代，當天主教士們發現了這些小島之後，才出現了幾個小規模的定居點。1558年，一位多明我會的主教若熱·德聖盧西亞（Friar Jorge de Santa Luzia）被派往新設立的馬六甲主教區，在他的指示下神甫和修士們在這個東南亞的偏遠地區正式展開了傳教工作。⁽⁶⁾

儘管葡萄牙多明我會的史料對這段歷史記載有些誇大其實，但它還是為16-17世紀東南亞和東印度尼西亞的歷史研究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料。按照多明我會記載，當時葡萄牙傳教士受到當地人民的熱情歡迎，他們建教堂、劃設教區並使超過十萬當地居民皈依天主教，但據荷蘭人從17世紀初開始記載的史料顯示，實際上教徒數目根本不會超過一萬二千人，我們認為荷蘭人的資料更為可信。⁽⁷⁾當時，這些多明我會修士已經在東非傳教的基礎上積累了豐富經驗。那時的東非傳教工作主要集中在現在莫桑比克中部地區的贊比西河沿岸。而且，他們與強大的莫諾莫塔帕王國有着歷史關係，同時在從桑給巴爾島至紅海的這一地區中，他們也都與穆斯林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貿易往來。實際上，幾位多明我會修士在處理索洛島的傳教工作時正是借鑒了他們此前在東非傳教的經驗。他們曾努力將生活在東南非贊比西河、塞納河還有古阿媽（Cuama）河地區的黑人教化為基督徒，因此在教化索洛島居民的過程中他們參照了此前的經驗。

在1566-1571年間，多明我會修士們在索洛島上建了一個堡壘，並在馬六甲軍事長官的批准下獲

得任命索洛島上尉的權利。該批文是在1571年9月由印度總督簽署的：有感索洛島上的機構不安全，需要一支小編制的軍隊，以維護正常的傳教工作，因此賦予多明我會修士任命索洛島上尉的特權。官方對多明我會宗教活動的認可隨着伊比利亞人的統一而有所改變。隨着東南亞和東亞地區的發展變化，菲利普二世入主葡萄牙改變了傳統的社會格局和勢力分配，尤其是給政治商業中心與周邊地區的辯證關係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最後，區域貿易的戰略中心徹底轉移到了南中國海地區，也就是澳門與馬尼拉之間的地區。

伊比利亞聯盟與東方的葡萄牙帝國

1578年7月北非的三個國王在奧加什奧卡比（al-Qasr-al-Kabir）地區進行了一場殘酷的戰役，塞巴斯蒂昂（D. Sebastião）就是死於該戰役的。其後他年老多病的叔叔恩里克主教（Cardinal D. Henrique）繼承了王位。1580年恩里克去世又引發了另一場危機。幾個王位爭奪者開始相互對抗，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國王。他的父親是一位貴族而母親則是葡萄牙伊莎貝爾（D. Isabel）；另一位就是教區神父安東尼奧（D. António, 1531-1595），他是路易斯王子與一個猶太女人的私生子。安東尼奧在王國的幾個主要城市中威望最高，但由於他的母親是新派基督徒，因此在葡萄牙貴族社會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在恩里克去世前，菲利普二世就已採取大規模的外交攻勢以防止安東尼奧稱帝控制里斯本，同時還在西班牙的埃什特雷馬杜拉地區組建了一支強大的軍隊。當得悉安東尼奧取得了聖達倫市（Santarém）的擁護後，菲利普二世立刻下令攻打安東尼奧。一支三萬人的先遣隊打進了葡萄牙，迫使安東尼奧放棄首都並出走波爾圖。安東尼奧在波爾圖消磨了一段時間之後，在歐洲度過了多年的流放生涯。

在一系列強硬的軍事、外交、司法和交際手段之後，1581年4月菲利普二世在托馬爾議會上順利即位。在塞巴斯蒂昂去摩洛哥冒險的那段時期，葡

聖拉扎勒斯島（又稱菲律賓群島）／出自16世紀安東尼奧·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的目錄手稿 ►



Bohol . Raia . Cibahanui

Icy mourut
le capitaine
general

Mattan

Zzubu :

葡萄牙貴族雖並未被徹底打倒或囚禁，地位卻已明顯下降，因此對於他的即位已乏力反對。但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他鄭重承諾了要建立一個政權以維護葡萄牙人在整個王國範圍內的特權，而卡斯提爾王國卻不在此範圍之內。⁽⁸⁾實際上，托馬爾議會已同意將行政內閣移交給新建立的葡萄牙參議會，無論國王身處何地，內閣都要直接對國王負責；當國王離開王國時，內閣祇能由具有皇家血統的總督或議會代管。也就是說，議會同意君主制政體必須服從於神聖的葡萄牙王國：沒有一個外國人可以在司法和財政部門任職。這種排外性還表現在神職人員的任用上，包括主教、修道士、領聖俸者和私人神甫。在軍隊人員的任命上也如此，軍權完全被集中在國王手中。菲利普二世在法律程式上審慎態度實際上是為他在葡萄牙的合法地位打下扎實基礎，而那些象徵性的就職儀式恰恰就代表了新王登基時的政權交替：菲利普二世要求三個階層（宗教、貴族和人民）的代表都必須向他和他的繼承人迭戈（D. Diogo）宣誓效忠。而在此之前的君主，無論是曼努埃爾、若昂三世還是塞巴斯蒂昂都從來沒有過類似的要求。⁽⁹⁾

在葡萄牙領土擴張方面，托馬爾議會於1581年4月設立機構管理不同的地域，這一機構是完全脫離於各殖民政權之外的。為了鞏固這個決議，剛剛登基的葡萄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經由果阿和馬尼拉下達明確的命令，禁止他在東亞的臣民進入專為當地人保留的區域。無論如何，當菲利普二世即位的消息傳到馬尼拉的時候，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包括地方長官、神職人員、商人和冒險家都感到歡欣鼓舞。因為他們在中國的利益顯然從此會得到重新分配，而且也有利於他們更加主動地操控摩鹿加島的香料貿易。在那之前，在當地佔主導地位的葡萄牙人總是粗暴地用武力禁止他們參與香料貿易。但馬尼拉方面的狂熱情緒並沒有得到亞洲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的回應。

比如說，果阿地區就是在1581年9月3號才宣佈效忠哈普斯堡君主的。因為當地的地方官被懷疑與安東尼奧有書信往來從而受到指控，因此他們是

在經過了兩天的艱難談判之後才同意宣誓的。⁽¹⁰⁾在馬六甲，反對效忠菲利普二世的主要是葡萄牙自己的上尉若昂·達伽馬（D. João da Gama）。萊奧列爾·利馬（Leonel de Lima）乘船到馬六甲要求他宣誓效忠，但他一直抗命，直到1581年11月23號才舉行效忠儀式。⁽¹¹⁾摩鹿加群島的情況就更奇怪了，1582年3月10日當弗朗西斯科·杜埃尼亞斯（Francisco Dueñas）率船到達蒂多雷時，蒂多雷的上尉在沒有與果阿和馬六甲取得聯繫的情況下就直接從菲律賓地方官兼軍事總長貢薩洛·諾蓋略·德佩尼亞洛薩（Gonzalo Ronquillo de Peñalosa）那裡獲悉了菲利普二世登基的消息。⁽¹²⁾而後者是在與聯合王國取得正式溝通後開始有機會搜集一些關於德那地（Ternate）的重要戰略資訊。至於澳門的情況就更複雜了。⁽¹³⁾菲利普二世獲取王位的消息引起當地葡人的不滿和猜疑，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虎視眈眈的野心令他們感到不安，同時他們也害怕那些西班牙人會介入他們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之中。耶穌會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anches）在結束為期兩個月的中國之旅後將新王登基的消息帶到澳門。阿隆索·桑切斯在澳門遇到了來自印度省耶穌會的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此人通過一系列圓滑老練的外交手段將葡萄牙菲利普二世加冕的消息傳播開來。人們以不同的方式漸漸地都獲悉這個消息，但許多帶有爭議的問題都被故意回避了：首先，菲利普二世的即位是在阿爾巴（Alba）公爵的協助下完成的，是他率軍攻進葡萄牙並強迫葡萄牙人接受菲利普二世的；其次，就是對里斯本和卡斯凱什的洗劫；第三，教區神父安東尼奧近乎神秘的失蹤。聯合王國還一直試圖向中國政府隱瞞葡西兩國聯合的事實。古西班牙人的名聲本來就不太好，他們被澳門地區的葡萄牙人看作是間諜和侵略者，由於害怕再次背上這個罪名，所以在這件事上他們一直採取隱瞞的策略。後來他們對呂宋島的軍事佔領也證明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在經過長時間的反覆斟酌之後，直到1582年12月18日澳門葡人才同意宣誓效忠於菲利普二世。據當時的文獻記載，西班牙人的介入可能會影響到澳門地區的利益同時也危及

菲律賓呂宋島的安全。⁽¹⁴⁾

菲利普二世實行了行政獨立互不干涉的政策，想借此解決葡西兩國間眾所周知的敵對和競爭，但是，東亞地區的伊比利亞人想以整個貿易線路上的幾個重要軸心為基礎，進而控制整個內陸地區，他們這種不安於現狀且工於心計的天性，使他們不可能乖乖地遵守菲利普二世的政策。西班牙和葡萄牙各自的勢力範圍無論在時間還是地域上都相差很遠。無論是從各自半島的中心還是從印度和新西班牙的總督轄區，這些地區間的距離都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航行才能到達。因此要想對當地政權和各種各樣的私人企業加以控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¹⁵⁾由於他們之間的領土範圍相距甚遠，因此皇室的命令在下面得不到很好的貫徹。從望加錫到帝汶島，從事非法活動的大有人在，包括商人、逃犯還有冒險家。實際上，葡人祇控制了摩鹿加群島的幾個要塞，他們企圖佔領小巽他群島周邊一些小島，尤其是弗洛斯的東部和索洛島。駐紮在長崎和澳門的一些小社團對於馬六甲主要港口的官方機構來說簡直是微不足道。馬六甲的主要港口曾經是這一周邊地區的中心，但是它的核心地位現在也逐漸被弱化了。在伊比利亞人對該地區的重組過程中，那些小社團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南中國海和澳門地區的貿易上來。在菲利普的伊比利亞王冠背後，我們看到在菲律賓群島祇有幾百個西班牙人，而他們主要集中在馬尼拉的港口和呂宋島西海岸附近的一些小島上。⁽¹⁶⁾

正如費爾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葡西聯合王國的出現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它標誌着偉大的伊比利亞人開始向大西洋、巴西轉移，不久之後在黃金白銀的誘惑下他們又繼續向墨西哥和秘魯遷移。菲利普二世加冕為葡萄牙國王，這一事件對於東亞到底有何影響？我們對此研究得還很少。商人和冒險家在東南亞地區瘋狂地進行商業活動，他們在那裡營造出許多黑暗的小王國，對於這些我們也知之甚少。聯合王國的出現可能為那裡一些商業聯盟和組織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契機。更重要的是，從官方角度上講，在受到葡西兩國勢力

影響的亞洲地區，新王登基恰恰是迎合軍國主義者的需要。當時所謂的葡屬印度向周邊發起了軍事挑釁，比如他們曾試圖征服亞齊特區的伊斯蘭教國家蘇丹。16世紀70年代他們喪失了在摩鹿加群島的優勢地位，因此在馬六甲教會最高層的慫恿下，他們開始攻打蘇丹企圖恢復他們的優勢地位。這樣，在菲律賓的基礎上，他們又制定一套新戰略圖謀將勢力範圍擴大到中國和摩鹿加群島。⁽¹⁷⁾這種軍事行動通常都與伊比利亞人有關並且動機各不相同，但是這些軍事行動無論是在軍事上、領土上還是在商業上都沒有取得任何成果。菲利普二世成功入主葡萄牙使他陷入盲目樂觀的境地，從而多次主動發起軍事進攻。記得其中有一次也就是在1583年，葡萄牙在摩鹿加的守軍上尉向馬尼拉求援，後者通過調用聯合王國的部隊給與援助，派出由若昂·諾蓋略(João Ronquillo)率領的十艘戰艦，幫助葡萄牙人抵抗爪哇商人。但這場激烈的戰鬥除了燒燬幾艘爪哇人用來運輸丁香的船隻之外幾乎沒有取得任何商業結果。⁽¹⁸⁾

儘管菲利普二世曾承諾會尊重葡人在亞洲地區的政治、商業特權，但實際上在他甫掌權的頭幾年他就對葡萄牙的東方帝國做出多處重大改變。從地方官員的任用到政治結構，他都做了一系列調整。這些調整有利於那些拚命尋找新財源的舊貴族，卻損害了包括軍隊、地方高官在內的海外貴族的利益。由於海外貴族日益被排斥在里斯本宮廷之外，因此他們不得不將軍功與商業利益相結合。菲利普二世對亞洲勢力的重新劃分所起的重要作用還表現在索洛島和帝汶島地區。

菲利普二世與帝汶-索洛島地區的殖民制度

在小巽他群島有許多小塊的葡萄牙殖民地，菲利普二世實際上是想把這些各自為政的殖民政權納入國家政權，從而重新定義其周邊策略。因此，他從索洛島的多明我會手中收回任命當地駐軍上尉的權利。為了在其所佔領的殖民地實現長期的人種融合，他還專門從已婚的或是混血者中間選用地方

官。當地的混血人種被稱作多巴斯 (topasses)⁽¹⁹⁾，17 世紀大量多巴斯的出現最終將這一指導思想推向頂峰。從政治和法律的規律上來說，菲利普二世獲取王位後，必然會任用新的駐軍上尉接掌索洛島和帝汶島。1583 年 3 月，在新的周邊策略思想的指導下，菲利普二世任命安東尼奧·德·安德里亞 (António de Andria) 為索洛島和帝汶島的守軍上尉。此人已婚，來自馬六甲，在當地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按照當時正規的政治程式，祇有葡萄牙本土人士才能被允許提名為海外殖民地官員，而安東尼奧·德·安德里亞並不是純粹的葡萄牙人，因此他的任命就打破了這一禁令。⁽²⁰⁾ 作為一名上尉所需承擔的職責其實並不多，然而由於葡萄牙政府沒有付給他薪水，而且他又捲入到當地一些投機生意中，因此他似乎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名稱職的上尉。自此，多明我會行政任命的特權就被逐漸收回了。實際上 1589 年菲利普二世任命杜阿爾特·德·梅內塞斯 (D. Duarte de Meneses) 為印度總督其實也是為了削減多明我會在索洛島和帝汶島上的勢力。⁽²¹⁾ 這個地區雖然地處偏遠，但由於它的特殊地位，使該地區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殖民政權上都獲得了發言權。同時該地區也為葡萄牙的新任君主提供了施展其影響力的重要舞臺。這裡是葡萄牙東方帝國的最終前哨，為了將這裡的利益重新分配，菲利普二世試圖將索洛島和帝汶島上的軍事政權與菲律賓政府相結合，從而拓寬貿易路線，擴大合作範圍。在菲利普二世之後的幾位繼任者奉行的仍然是這一策略。⁽²²⁾ 在 16 世紀 90 年代之後，越來越多的商人和傳教士到這裡投資遊歷，從而將帝汶島和菲律賓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那些銀幣也是由他們第一次帶到這些小島上來的。這些銀幣開始並沒有在流通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很快就變成了裝飾品，直到 19 世紀人們才意識到它的流通作用。菲利普二世還有另外一個更為宏大的計劃，他想將巴達維亞變成東南亞新的商業金融中心。但由於荷蘭人一直控制着那個地區的經濟，而菲利普二世對於恢復葡萄牙人在那裡的地位又顯得力不從心，更何況要從荷蘭人手中奪回控制權，因此他的計劃注定是要失敗的。

然而，還有一個更為奇特的因素使帝汶島與菲利普二世之間的關係至今仍無法剪斷，那就是反對勢力所帶來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菲利普二世的政權得到大家的支持，也受到大多數葡萄牙貴族和神甫的尊敬，但對於他的雙重君主制，無論是社會上還是宗教界仍不斷有許多反對的聲音出現。這些反對勢力認為總有一天他們的救星塞巴斯蒂昂會返回葡萄牙，他們堅信他還活着決不會就此永遠消失在摩洛哥。這些塞巴斯蒂昂的追隨者總是用不同的預言和行動來證明他們的觀點：一次是在 1580 年 3 月，一個來自英雄港的工匠宣稱自己就是人們盼望已久的國王；1584 年，一個佩納馬科爾鄉村的農民又聲稱他就是塞巴斯蒂昂；過了沒多久，又輪到一個隱士出來宣稱自己是國王了。⁽²³⁾ 類似的各種說法 and 觀念基本上都是在一個被流放神甫的煽動下出現的，此人叫做若昂·德卡斯楚。德卡斯楚曾將若阿金主義與那些追隨失勢的安東尼奧的宗教界人士聯繫到一起，正是他發現了一些由一個名叫班達拉 (Bandarra) 的鞋匠創作的預言詩歌。這些詩歌宣稱，一個由一位神秘的國王領導的新時代將於 1530 年誕生。許多神甫都對塞巴斯蒂昂追隨者的行動抱支持態度。1598 年，威尼斯再度出現了一個宣稱自己是塞巴斯蒂昂的人，此人是一位年輕的冒險家，他以塞巴斯蒂昂的身份去見當時的共和國總督，他解釋說自己此前一直在非洲遊歷，現在剛剛回來。他在威尼斯被逮捕了，但又於 1600 年被釋放了。他受到了包括若昂·德卡斯楚在內的許多流亡組織的熱烈歡迎，並和他們一起爭取得到法國和托斯卡納 (意大利行政區) 的支持。後來在那不勒斯他被移交給了西班牙人，並於 1602 年被判在船上服役，但是第二年人們又在加的斯海域發現他，他煽動塞巴斯蒂昂的追隨者起義回應他。後來，這個假塞巴斯蒂昂和所有牽涉這一事件的人都被判處了死刑。他們從此消失了，但他們真的就這麼消失了嗎？

至少有一夥東帝汶人就堅持認為人們不應該過分信任菲律賓人，因為他們和西班牙人一樣將會進一步損害葡萄牙在帝汶島的利益。至少有一個東帝汶人組織堅稱不該過多地相信菲律賓人，因為他們

和“古西班牙人”一樣祇會進一步損害葡萄牙在帝汶島的利益。這些帝汶人屬於帝汶人民黨，這是一個非常“本土化”的政黨，在國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上，該黨有兩位代表當選。⁽²⁴⁾該黨領袖雅各布·沙維爾(Jacob Xavier)在選舉集會上曾多次在公眾面前表示他是帝汶島和葡萄牙的真正國王；實際上也就是葡萄牙王位唯一合法的繼承人。那他到底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呢？沙維爾堅持聲稱葡萄牙的歷史可以證明這一點，16世紀時菲利普二世從葡萄牙王位的合法繼承人安東尼奧手中奪取了王位，侵佔了他的國家，並將他流放到葡萄牙在亞洲的殖民地，而自己恰恰就是安東尼奧的直系後裔。

【註】

- (1) 我們可以在 *Katalog Pameran Koleksi Warisan Budaya Timor* 找到該博物館以前的一份藏品清單。*Timur, Departeme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Direktorat Jenderal Kebudayaan, Museum Negeri Propinsi Timor Timur, Tahun, 1995-1996.*
- (2) 若澤·曼努埃爾·加西亞(José Manuel Garcia)和伊沃·卡內羅·德·索薩(Ivo Carneiro de Sousa),《第一套葡萄牙地圖和東南亞及菲律賓概況圖(1512-1571)》,里斯本,CEPESA,2002。
- (3)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弗·羅德里格斯手稿》,fl.36,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出版(Bibliothèqu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de France)。
- (4) 若澤·曼努埃爾·加西亞和伊沃·卡內羅·德·索薩前引書,頁14。
- (5) 安東尼奧·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El primer viaje alrededor del mundo. Relato de la expedición de Magallanes y Elcano*, (伊莎貝爾·德里克爾編輯),巴賽隆納 Ediciones B 出版,1999。
- (6) 這一時期的重大事件主要是依據由路易斯·德·索薩(Fr. Luís de Sousa)記錄的葡萄牙多明我會編年史,《多明我會史》由洛佩斯·阿爾梅達(M. Lopes Almeida)編輯,波爾圖,Lello & Irmãos 出版,1977,第二卷。還有若昂·多斯·桑托斯(Fr. João dos Santos)所著的《東安索比亞》由路易斯·阿爾布凱克和瑪麗亞·德·格拉薩·佩里康(Luís Albuquerque & Maria da Graça Pericão)編輯,里斯本 Alfa 出版,1989年,第二卷。

- (7) 查理斯·博克瑟(Charles R. Boxer),《遠東的貴族(1550-1770)》,海牙 Martinus Nijdhof 出版,1948年,頁175-176。
- (8) 瓊-弗雷德里克·蕭布(Jean-Frédéric Schaub),西班牙君主專制時期的葡萄牙,里斯本 Livros Horizonte 出版,2001年,頁21-22。
- (9) 瓊-弗雷德里克·蕭布前引書,頁22。
- (10) 迪奧戈·多科托(Diogo do Couto),《亞洲第十個十年》,里斯本 Livraria Sam Carlos 出版,1974年,頁42-53。
- (11) 迪奧戈·多科托前引書,頁49-157。
- (12) 迪奧戈·多科托,前引書,頁307-312。
- (13) 文德泉神父(Pe. Manuel Teixeira),〈澳門在西班牙統治時期向菲利普二世表忠心〉,《澳門與其教區》,I,澳門 Orfanato Salesiano 印刷,1940年,頁115-141。
- (14) 曼努埃爾·奧列(Manuel Ollé) *La empresa de China. De la Armada Invencible al Galeón de Manila*, 巴賽隆納 El Acantilado 出版,2002年,頁107-108。
- (15) 曼努埃爾·奧列前引書,頁93。
- (16) 洛德斯·迪亞斯(Lourdes Díaz-Trechuelo),《菲律賓——沒有被認識的大地(1565-1898)》,Pamplona, Ed. Navarra 大學出版,2001年,頁34-73。
- (17) 曼努埃爾·奧列前引書,頁94。
- (18) 迪奧戈·多科托前引書,頁313-320。
- (19) 這一叫法可能源自 Dravidian *Tuppasi*, 涵義為譯員。
- (20) 東波塔國家檔案館研究所(IANTT), 菲利普一世外交部, 贈書15, fls. 28-28v, 贈書28, fls. 81-81v. - n.º 383.
- (21) 印度州歷史檔案館(AHEI),《季風集》*Livro das Monções* n.º 3-A.
- (22) IANTT, 菲利普二世外交部, 贈書2, fls. 117-117v; 贈書6, fls. 132v.-133; 贈書7, fls. 189-189v; 贈書10, fl. 321; Livro 20, fl. 276v.; 贈書23, fl. 316v.; 贈書29, fls. 193-193v.; 贈書31, fl. 101, 菲利普三世外交部, 贈書23, fls. 349v.-350; 贈書29, fl. 373v.; 贈書40, fls. 255-255v.
- (23) 瓊-弗雷德里克·蕭布,前引書,頁57-58;伊弗-瑪麗·貝爾瑟(Yves-Marie Bercé)《隱藏的皇帝。救星與偽君子。現代歐洲的通俗政治神話》,巴黎 Fayard 出版,1990年,頁16-81。
- (24) 呂德斯·席爾瓦-卡內羅·德索薩(Lurdes Silva, Carneiro de Sousa)《東帝汶國民代表大會選舉實錄及評述》,里斯本,CEPESA, col. Cadernos 出版,2001年,頁14。

張雨虹譯

